
《大學》在東亞及有關問題*

李慶

金澤大學外國語教育研究中心

本文研究了《四書》之一——《大學》的形成、作者、文字變遷，論說了《大學》在中國以及東亞（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的流布概況，並在此基礎上，對若干有關儒學的問題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大學》 東亞 儒學

* 本文曾在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華東政法大學、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共同舉辦的「古代中國和東亞國際研討會」（上海，2013年7月9日）上宣讀。

《大學》是《禮記》中的一篇，在宋代以後成為《四書》之一，作為儒學的代表性經典，《大學》在中國乃至東亞的思想和社會歷史上，都有巨大的影響。關於《大學》的論著，古往今來可謂汗牛充棟。本文就有關《大學》的爭論，結合該書在東亞的傳播及有關問題，談一點粗淺的看法。

一、有關《大學》的論爭

要探討《大學》在東亞社會的影響和作用，首先就涉及《大學》文本的各種意見和爭論。

宋代以前，《大學》作為經書《禮記》中的一篇，基本上未見大的論爭。南宋朱熹將其和《中庸》一起從《禮記》中抽出，列為《四書》之一，提出「學問須以《大學》為首」之說，¹對《大學》加以注釋闡發。到了明代永樂以後，《大學章句大全》作為欽定的《四書大全》之一，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典籍，²多被社會關注，也就由此產生了各種與《大學》有關的問題。主要有這樣幾個：

（一）《大學》產生的年代

主要有如下不同的意見：

1. 形成於春秋末期到戰國初期說。也就是所謂「早出論」。此說乃是宋代以前學者的基本看法。認為《大學》成書較早，可上溯到孔子、曾子。自明末清初以來，《大學》出自孔子、曾子的觀點受到懷疑，不少學者認為《大學》成書是在秦漢以後。近年有學者根據楚簡《老子》乙本中有「修於身」、「修於家」、「修於鄉」等說法，認為將《大學》分為經傳之說應重新考慮，主張《大學》是獨立的

1 朱熹將《大學》編入《四書》，認為：「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見朱熹：《朱子語類》（臺北：正中書局，1970年），卷一四，頁397。

2 《四書大全》等刊於永樂十三年（1415），是永樂十二年十一月，永樂帝命翰林院儒臣胡廣、楊榮等按照朱子的解釋編纂的。見《明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冊，卷十六，頁715。

一篇，當恢復早出之說。³

2. 戰國到秦漢之際說。清朝汪中的《大學平議》曰：「《大學》其文平正無疵，與坊記、表記、緇衣伯仲，為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於孔氏為支流餘裔。師師相傳，不言出自曾子。」⁴就是認為《大學》是在曾子、「七十子」以後，即戰國時代的產物。

3. 秦以後形成說。明末清初的學者陳確認為，「非秦以前儒者所作可知」。此說開後來姚際恒等的辨偽之說。⁵近人徐復觀根據《大學》引述《尚書·秦誓》等證據，推論《大學》乃是「秦統一天下以後，西漢政權成立以前的作品」⁶，大致也是這個看法。

4. 是漢代漢武帝前後的作品。清代的陳澧認為：《大學》與《禮記·學記》均論說「大學之道」，有相近之處，當為相互發明之作；推論「大學」或指當時的學府「大學」。⁷此說在後來為日本學者武內義雄進一步展開，認為該書的出現，和漢武帝時設立「大學」有關因而是當時前後的作品。⁸

（二）關於《大學》的作者

與《大學》產生時代相關聯的問題，是其作者孰是的論爭。對此也有不少說法：

1. 孔子、曾子之作。二程認為：「孔氏之遺書」。⁹朱熹更認為：第一節為「經」，「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

3 梁濤：《大學》早出新證，《中國哲學史》2000年第3期，頁88-95。又見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一卷，第二十章《大學》新釋，此章也是梁濤所著。

4 汪中：《述學補遺》（千頃堂書局石印本《述學》所收，民國年間印本），頁14。

5 陳確：《大學辯》，《陳確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別集，卷一四，頁552；又參見林慶彰：《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臺灣文哲出版社，1994年），頁350。

6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徐復觀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卷，頁244。

7 見陳澧：《東塾讀書記》（上海：中華書局，據《四部備要》原刻校刊本，具體年代不詳），頁82。

8 武內義雄：《學記大學序》，《武內義雄全集》（東京：角川書店，1980年），第三卷。轉引自金谷治：《大學解說》，《大學·中庸》（東京：岩波文庫，2006年），頁23。

9 朱熹：《大學章句集註·題解》，《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下引《章句集注》，俱出此本，不另注。

意而門人記之也。」¹⁰ 也就是主張，該書是曾子一系之作。這一看法近千年來，被大多學者引用。但近年也有學者反駁其他意見，主張《大學》出於曾子或其弟子之手完全是可能的。¹¹

2. 子思之作。明代學者豐坊¹² 認為：「《大學》、《中庸》，子思一人作，《大學》乃《中庸》第四十七篇之第三篇也。」這一看法，早在宋代王柏就曾提出，近年也不乏響應者。¹³

3. 荀子一系學者所作。馮友蘭認為乃是戰國後期的荀子後學所作。¹⁴ 這一看法，近年又得到臺灣大學的劉又銘的支持。¹⁵

4. 漢代的儒者所作。日本武內義雄認為是漢武帝以後博士的作品。¹⁶

(三) 關於「大學」的意義和《大學》的性質

對於「大學」這一書名的理解，以及對於該書性質的區判，亦有不同看法：

1. 「大學」究竟何意？是指教學的機構，還是所說的內容？朱熹在《大學章句序》中說：「《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在《大學或問》中說：「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小學，是指「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等，而大學則是以「格物致知」為始。¹⁷ 對這一段話的解說，出現了歧義。一般認為《大學》是指古代大學培養君子、大人的教材。而另外有

10 《大學章句》第一章後解說，頁4。

11 梁濤：《大學》早出新證，頁92-94。

12 豐坊：《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一九一 豐熙傳，頁5071云「子坊，字存禮。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出為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謫通州同知。免歸。」豐坊是個官場不得志之人，後多上書，參與「大禮儀」之爭。所獻之書和各種著作，後多有非議者。

13 豐坊語見郭沂：《子思書再探討——兼論《大學》作於子思》載，中國哲學史學會編《中國哲學史》2003年第4期，頁29-35。王柏之說見《魯齋要語》，參見前注3。今人則有梁漱溟等，見下文。

14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14章，頁437。

15 劉又銘：《大學》思想的歷史變遷，收入黃俊傑主編：《東亞儒者的四書詮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6。

16 見前注8。

17 朱熹：答胡廣仲，《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卷四二，頁6。

學者則強調，《大學》當是和中國古代的「大學」有相當的關係。¹⁸ 所以，《大學》在 17 世紀被翻譯到歐洲後，就有不同的翻譯法：英譯本作「*The Great Learning*」，而有的學者則提出可譯作「*The University*」、「*The Universitas*」。¹⁹

2. 《大學》是否是儒學的基本經典？有人認為，《大學》乃是儒學的基本綱領著作，涉及國家政治之書。鄭玄說：「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²⁰ 有人認為是反映了儒家思孟學派的思想。也有學者認為，《大學》根本不是儒家的經書，也不是「聖人」之教。²¹ 汪中認為《大學》「首末相應，實處一口，殆非所以解經也。」²² 日本的伊藤仁齋，也認為《大學》和孔孟的教義，多有不同。²³

（四）關於《大學》的文本

《大學》的文本主要有三種：

1. 朱熹將《大學》和《中庸》一起從《禮記》中抽出加以解釋時，提出《大學》的文字當有經傳之區別，又存在錯簡。於是朱熹根據自己的意見加以改正，並做了最重要的增補，新增了「格物致知」的一段「傳」，此為《大學章句集注》本。

2. 明代王守仁提出了《大學》古本說。在王守仁的弟子徐愛等編的《傳習錄》開頭，開宗明義地指出：「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為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按：這裡的先儒，當是指朱熹等人。）認為：「人之為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

18 見前引清代陳澧之說，又見日本學者赤塚忠譯注：《大學》（東京：明治書院，1998年，日本明治書院《新譯漢文大系》本）的「解題」，頁 27-28。

19 西文譯本最早的有 1730 年巴耶爾（Bayer）譯成拉丁文的：《*Confucii Ta Hio*》。歐美世界比較經典的理雅各（James Legge）的譯本，作 *The Great Learning*。見王爾敏編：《中國文獻西譯書目》（臺北：商務印書館，1976 年），頁 26-27。

20 《禮記·大學》篇題注，《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1673。

21 陳確：《大學辯》，《陳確集》，頁 552。

22 汪中：《大學平議》，《述學補遺》，頁 14。

23 見伊藤仁齋：《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引自日本源了圓編：《江戸の儒學——大學受容の史》（東京：思文閣出版，1988 年），頁 91。

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²⁴ 就是認為朱熹的說法沒有根據。《大學》就應該如《禮記》中所收的那樣，即《大學》古本。他又先後寫了《大學古本序》進一步闡明自己「致良知」的理念。²⁵ 這在明朝中後期的中國思想舞臺掀起了一場大波，其影響甚至可以說延續至今。

3. 石經《大學》。由於官方的提倡，又由於王守仁對朱熹說的批判，《大學》成了社會和學者關注的焦點之一，於是就有了1560年豐坊發現的《大學石經》之事，出現了「大學石經」的文字。簡要而言，是豐坊提出有此文字，後王文祿將所見本刊行，即所謂的古代《石經》。²⁶ 此事遭到明代學者陳耀文的批判，在其所著《經典稽疑》中指其為偽作。²⁷ 明代還有一些其他人的改本，如季本、崔銑等，見清代毛奇齡的《大學證文》，在此不贅。

上文可見，關於《大學》一書，兩千多年來，尤其宋以後的近八百年來，存在諸多問題尚未解。對於這些問題，雖說歷代不乏論者，而歸納起來，主要焦點有如下兩個：1、《大學》是否和古代作為教育機構的「大學」的出現有必然聯繫？2、《大學》的文本中包含著各種文獻資料，學者們根據自己理解，對這些資料的時代判斷是否正確？然後在此基礎上，再推斷出自己的結論是否能取得共識。

筆者認為，這些不同角度出發的探討，多少存在一些古代文獻研究的通病，即把一種可能性當成必然性，由之加以推斷，甚至下斷語。這是中國「考證」研究長期以來的一種病症。對於史料的推斷當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沒有定性的資料，推斷永遠是處於特定時空的推斷者的推斷，不可能作為確定的結論。對於《大學》諸

24 王守仁：《答羅整庵書》，陳榮捷：《傳習錄詳注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頁248。

25 王守仁《大學古本序》其實存在兩種文字，有所不同，可以看出他思想發展的情況。尤其為判斷「致良知」之說確立的時期，提供了資料。見束景南：《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524-527。

26 王文祿本今有《百陵學山》本留存。關於石經《大學》的提出過程以及有關論爭，可見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年），第四章；又林慶彰：《清初的群經辨偽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七章。

27 原書已佚，見毛西河：《大學證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0冊，頁278。關於《大學》石經本，見上書頁288-291。

問題，筆者認為，至今尚未見到公認的定性資料。因此，以上的各種爭論或許只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存疑待考可也。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至晚在兩千多年前漢武帝時代（公元前 130 年前後）的《禮記》中，已經有了《大學》的文字（最早或可以上溯到春秋末到戰國初期，即公元前 400 前後），可以說是儒家學說的產物。放到世界歷史的視野中看，《大學》的出現在世界上是相當早的、影響著人類思想和文明的著作之一（主要在東亞）。這樣的著作在人類文明史上又有幾種呢？因此，它的重要地位是顯而易見的。明確了有關文字的基本問題，下面來看具有爭論的《大學》在中國和東亞的社會歷史中的流傳和影響。

二、《大學》在東亞的流布

《大學》在 15 世紀以後，在東亞地區廣為流布，影響深遠。我們試簡要概括一下：

首先來看《大學》在中國的流傳。雖說西漢末的大學者劉歆、東漢的經學大師鄭玄曾言《大學》「可以為政」，²⁸ 但它作為經書《禮記》中的一篇存在，在當時並沒有受到特別重視。到了唐代，韓愈的弟子李翱曾以《大學》論性。²⁹ 至宋仁宗時，特將《大學》從《禮記》中取出賜給臣下，漸廣流布。³⁰ 司馬光曾撰有《大學廣義》，³¹ 後來經過程頤、程顥的解說，因朱熹的提倡，《大學》漸為世人關注。朱熹撰有《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集注》即為其中之一，《大學》遂獨立成書流行。然而在宋代，有關《大學》的專門論著也頗有限，如張九成作《大學說》，³² 真德秀作《大學衍義》，金履祥作《大學

28 《禮記·大學》篇題注，《十三經注疏》，頁 1673。

29 李翱：《復性書》，《李文公集》，《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三六五，頁 1870-1874。又參見拙著：《中國文化中人的觀念》（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 年），頁 617-619。

30 陳確：《大學辨一》所收《辨補》：「蓋自宋仁宗特簡《中庸》、《大學》篇賜兩新第，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學者輒相新增附會，致美其稱，非有實也。」見《陳確集》，頁 562。

31 朱彝尊：《經義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9 冊，頁 170。

32 陳樂素：《宋史藝文志考證》（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46。

疏義》等，³³ 尚未如後來那樣發皇。

到了元、明兩朝，出現上百種《四書》的注釋之作，³⁴《大學》因列於《四書》之中，相關著述也隨之增多，這些著作多以闡述朱子之說為宗旨。明代的《大學》，有幾件值得重視的事情。首先，明初永樂年間，敕修《性理》、《五經》、《四書》的「大全」，闡述朱子之學，作為官方正統的意識形態。15世紀以後的數百年間，《大學》成為開科考試、選拔官員的經典文字，故《大學》廣為流傳。³⁵ 其次，明成化年間，丘浚博采六經諸史百家之文，對宋代真德秀的《大學衍義》加以補充，撰成《大學衍義補》，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奏上。宋朝真德秀的《大學衍義》，主要發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諸義，但缺治國平天下部分，是所謂「主於理」之作。丘浚補其所缺，廣徵博引，並加按語抒發己見，成一百六十卷的大書，分 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國用、明禮樂、秩祭祀、崇教化、備規制、慎刑憲、嚴武備、馭夷狄、成功化 十二章，即據其理而「主於事」。該書涉及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司法、軍事等各方面，也就是將《大學》理念具體化和現實的政治、經濟、國家形態聯繫了起來。再次，到明正德年間，王守仁對朱熹的《大學章句》這一經典發起挑戰，提出了「古本」《大學》的問題。王守仁認為朱熹將《大學》分為經傳，調動次序，增補文字，並不妥當。有關論說頗多，此不重複。³⁶

有清一朝，《大學》的流傳總體上不如明代。但是，近年《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錄的也有上百種。³⁷ 在清朝《大學》被提到了

33 《四庫全書》收錄。

34 雒竹筠編，李新乾補：《元史藝文志輯本》經部「四書類」、「四書之屬」著錄 90 餘種（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年），頁 72-80；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88-91。

35 見夏燮：《明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永樂十三年十一月」條；又見《千頃堂書目》「四書類」、「四書大全」條下注。

36 關於王守仁提出此說的時間，見錢德洪等編：《王陽明年譜》，《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1220-1327。關於王守仁和《大學古本》的記載，見上書頁 1253-1254，但《年譜》多有缺誤。容另外討論。有關王守仁對朱熹改本的批判見《傳習錄》等，學者多有介紹，此不贅引。

37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卷一四、卷一五。

更高的地位，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經典，其流傳有個起伏的過程。清初，文網尚未嚴密，故有陳確的《大學辨》，否定其為經典；顧炎武在《日知錄》對理學有所批判；李塨的《大學辨業》發揮顏元的思想，主張「平天下」當如「三代之時，天下皆諸侯分治之。」李光地《大學古本說》、胡渭《大學翼真》、毛西河《大學證文》等，多據「古本」，對前人諸說詳加考證，申抒己見。康熙非常重視意識形態問題，他說自己：「凡《四書》、《五經》、《通鑒》、《性理》等書，俱經研究」，³⁸ 提出：「帝王之學，以明理為先。」³⁹ 按照他的旨意，臣下編了《四書解義》，其中包括《大學》。這樣的欽定解說，成為當時最高的標準解釋。此後，學者的《大學》著述，大多闡發官定之義，因為如有違禁，便有殺頭之虞。雍正時期的謝濟世案（見下文），便是其例。雖說清代的考據學者如早期的姚際恒、晚清的陳澧等對《大學》作了不少考證工作，絲毫也沒有動搖該書作為正統經書的地位。直到清末成立京師大學堂，其中有關自然科學的學科仍起名為「格致科」，⁴⁰ 其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再來看《大學》在日本的流傳。《大學》最初是作為《禮記》的一篇傳入日本，具體時間有不同說法。比較確切的作為《四書》之一傳入日本的時間，大約在 1241 年，日本的僧侶僧弁元從中國回到日本時，和佛教的典籍一起帶回的。在後醍醐天皇（1318–1339 年在位）時，《大學》就在朝臣中廣為流傳。⁴¹ 《大學》一書，在日本的江戶時代異常發達。江戶時期林羅山（1583–1657）曾說：「《四書》那樣的書，載於商舶者，不可勝計。我家也有若干套，無暇閱看。」可見當時流入日本的狀況。⁴² 關於《大學》的著述，主要的有伊藤仁齋的《大學定本》，荻生徂徠的《大學解》，中江藤樹的《大學考》、《大學解》，中井履軒的《大學雜議》，太田錦城的《大學原解》，

38 中國史稿編寫組：《中國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卷七，頁 758–759。

39 同上注。

40 顧樹森：《中國歷代教育制度》（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246。

41 赤塚忠：《大學解說》，《大學·中庸》（明治書院本，1964 年），頁 16。

42 林羅山：《林羅山文集》（東京：弘文社，1930 年），卷七五。

海保漁村的《大學鄭氏義》，佐藤一齋的《大學欄外書》等。根據近年日本有關的調查，在江戶時代，日本有關《大學》的著述多達500餘種。⁴³這是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知識界的基本教養書之一，也是學術界最為關心的儒家著作。近年更有宇野哲人的《大學》、武內義雄的《學記·大學》和赤塚忠、島田虔次、山下龍二、金谷治等的譯注。

《大學》在朝鮮半島的流傳，早在《三國史記》就有記載。《大學》最早傳入朝鮮半島的時間迄今沒有定論，但據《三國史記》中神文王六年（公元686年）的記載：「遣使入唐，奏請《禮記》並文章」，當時唐朝「勒成五十卷賜之。」⁴⁴學者推斷，所賜《禮記》中，或包括《大學》。朱子的《大學章句集注》在朝鮮半島的流傳，主要是在「朝鮮王朝」以後。據說是由曾在元朝生活的白頤正帶回，他的岳父權溥，最早刊行了朱熹的《四書集注》。⁴⁵朝鮮王朝時期，不僅中央政府，而且所有的地方的道，都曾刊佈過《大學》，因而《大學》在韓國多有留存。根據學者最近的研究，僅《大學章句大全》的漢文本，韓國現在就有38種版本的545種留存。⁴⁶朝鮮半島朝鮮王朝時期以朱子學為主要意識形態，所以朱子注釋的《大學章句》成為最主要的經典。朝鮮半島主要研究的學者有李滉、李珥等，他們與其說是專門研究《大學》還不如說是在研究《四書》的同時自然地論說到《大學》。⁴⁷帶有獨立色彩的茶山丁若鏞，則有關於《大學》的論著《大學講義》和《大學公議》。

43 日本二松學舍大學編：《江戶漢學書目》（二松學舍大學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の研究報告，非賣品，2006年），頁58-70。

44 《三國史記》是記述朝鮮半島三國新羅、百濟、高句麗的正史。高麗仁宗二十三年（1145年）金富軾等以漢文編撰，共五十卷，計新羅本紀十二卷，高句麗本紀十卷，百濟本紀六卷，年表三卷，志九卷，列傳十卷，是朝鮮現存的最古史書。

45 《高麗史》（韓國延世大學資料室收藏本），卷一百零七，列傳第二十「權溥」：「嘗以朱子《四書集注》，建白刊行，東方性理之學，自溥始。」

46 蔡英蘭：《朝鮮時期《大學章句大全》的版本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本文有關朝鮮半島的史料，多引自該文。

47 李明輝：《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六章，頁159-193；第七章，頁197-231。

《大學》在越南的流傳和研究，從 15 世紀的黎朝開始展開。黎朝受中國明朝的影響，推廣儒學。《四書》和《五經》一起，成為官方的教科書。黎貴（1726–1783）曾作《四書約解》，對朱子的《章句》、《集注》加以說明推廣。阮朝吳廷階闡述《大學衍義》，以天道和陰陽觀作為《大學》的核心，並加以闡述發揮。後來又有黎文敵《大學晰義》。⁴⁸ 直到近年，還有越南學者提出要建立「人民的儒學」。⁴⁹

通過如上的簡單的概括可以看到，自 15 世紀以後，《大學》在東亞社會中傳佈廣泛，成為這一地區主要的價值觀念和政治理念的載體。其流布和展開存在形態有一些共同點，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其一，在東亞流傳的主要是朱熹的《大學章句集注》以及對此的解說之作。這部不長的綱領性著述包含著儒家基本的理念，可以說是東亞社會接觸歐洲外來的近代思想之前的教養之書，是培養知識階層或者一般群眾人格的基本經典之一。所謂修身養性、正心誠意、格物致知、「治國平天下」等觀念，成為這一地區主要的價值觀念和政治理念。朝鮮最有影響的儒學者李滉（1501–1570）把《大學》比喻為基礎：「大學則如塔樓千萬間結構於基址也。」⁵⁰ 日本的武內義雄說：「《大學》是中國古代儒學的精華和結論，同時也是近世儒教的出發點。」⁵¹ 宇野精一也曾評價：「如果說此書是政治思想的根幹，也許會有人認為自己對政治不關心，不是政治家。然而，儒家的思想乃主張由身邊始，漸及於遠。說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概聞之者甚多吧。」⁵² 可見，說到東亞的文明，說到東亞人的人格特色，不可能繞開這部著作。

48 李焯然：越南狂士黎文敵《大學晰義》對《大學》的詮釋，收入鄭吉雄、張寶三編：《東亞傳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初探》（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25–144。

49 島田虔次：《中國思想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頁613。

50 李滉：《退陶先生言行通錄》，卷二，頁92。轉引自蔡英蘭：朝鮮時期《大學章句大全》的版本研究 中文摘要，頁i。

51 武內義雄：學記大學序，《武內義雄全集》，第三卷。又見金谷治：大學解說，《大學·中庸》，頁23。

52 宇野哲人譯注：學術文庫本《大學》序（東京：講談社，2007年），頁4。

其二，《大學》作為政治理念或官方意識形態之作，它所標榜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所謂「三綱」、所謂「治國平天下」成為東亞地區各類政治人物的政治理念和國家形態的基礎。中國的《大學衍義補》成為明清時期政治的教材，⁵³ 所述各條成為國家制度的基本模式。在中國，皇帝本人對其學說的解說，具有絕對的權威。明代的李卓吾，五十以後「乃復研窮《學》《庸》要旨，知其宗貫，匯為《道古》一錄（筆者按：指《明燈道古錄》）」。⁵⁴ 因為觸犯了當時的「道統」，被迫害死於獄中。在清朝，朱子的《四書章句》是具有綱領性的《大學》，幾乎到了不准任何人置喙的地步。最典型的例子是雍正時期的謝濟世，因亂注《大學》而被判死刑（臨刑前免死流放）。⁵⁵ 這說明，在那個時代一般的觀念中，官方的《大學》解釋具有絕對權威性，不允許任何的偏離，更不要說懷疑批判了，否則便是可殺頭的罪名。《大學》的觀念對日本的政治影響也是顯然的，比如豐臣秀吉結束了中世紀日本的戰國狀況，實現了「天下統一」，這「天下」的內涵是什麼？有不同的說法，但是這詞語本身，在其深層受到《大學》等儒家經典中「天下」一詞和思想的影響，應該無法否定。還有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天皇的《教育敕語》，其實在其深層都有著《大學》「修齊治平」的儒學因素。以明朝正統的繼承者自居的李朝，還有越南自黎朝、阮朝、陳朝等，所行的也完全是模仿明朝的儒家國家形態，也就是所謂的《周禮》所規劃、被《大學章句》所歸納論說的政治理念。⁵⁶

其三，作為儒學的代表性文獻，《大學》以及朱子的《章句》成

53 據考，《大學衍義補》最早刊於弘治初，萬曆時再版，明神宗親為作序。明末有張溥刊本、陳仁錫刊本、喬應甲揚州刊本等，清代有《四庫全書》本。明清時有多種節本或述要行世，如明凌迪知《大學衍義補精華》十七卷、胡世寧《讀大學衍義虞見》二卷、清陳弘謀《大學衍義補輯要》十二卷等，為「帝王之學」的教本。

54 李贄：《聖教小引》，《焚書·續焚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二，頁66。

55 謝濟世，傳見《清史稿》列傳八十，康熙時進士，雍正年間捲入政壇風波，被判死刑，臨刑被赦。關於他的判刑有各種說法，而公開的理由是注釋《大學》，故又稱「注《大學》案」。

56 關於儒學對朝鮮半島、越南的影響情，參見朱雲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

為宋明理學的核心，成為東亞各國的經典，成為眾多的學者、學派進行探討論述的焦點。如前文所述，在中國形成了宋代以後理學內部的兩個最大的學派：朱子學派和陽明學派的爭論，後來清代的考據學派和近代的新學派也論及《大學》。日本的朱子學、陽明學派、古文辭學派、古學派的論爭，都涉及到對這部著作的闡述。在朝鮮半島、越南，朱子學占主導地位，有點異端色彩的丁若鏞、黎文敵的思想，也曾依託《大學》展開。⁵⁷

總之，整個東亞地區，《大學》被視為儒學或者是意識形態方面的最主要的代表作品，在論及古代中國和東亞社會時是不應忽視的。它在這一地區的政治思想、社會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一個可以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三、值得思考的幾個問題

在介紹有關《大學》這部古代的中國儒家經典的爭論、回顧它在東亞的流布的歷史概況以後，筆者想探討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關於「格物致知」的內涵和思維模式

《大學》是論說儒家教養之書，提出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等系統的概念。朱子《大學章句》的最大特點是對「格物、致知」這教養基礎的論說，根據二程之說，新增了「格物致知」條的《補傳》，強調：「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窮其理也」，「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這成為數百年學子格物治學的基本理念。《補傳》是朱熹對古代的理念的歸納，強調需要「即物窮其理」，這有其合

57 關於日本各學派間論說情，參見源了圓編：《江戸の儒學——大學 受容の史》。關於丁若鏞以《大學》闡述自己觀念的情，參見孫睿徹：丁若鏞治《大學》的幾個特點，收入鄭吉雄主編：《東亞視域中的近世儒學文獻與思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52-278。關於越南黎氏的情，參見李焯然：越南狂士黎文敵《大學晰義》對《大學》的銓釋，收入鄭吉雄、張寶三編：《東亞傳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初探》，頁171-195。

理的因素。但是在流傳中，這樣的「格物致知」之說被格式化、空洞化了，下面主要談一下其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把外在的世界簡單地歸納抽象化，使得學子的思維束縛在這抽象的概念之中，而具體的「物」的內涵卻空洞化了。具體的表現就是宋以後的理學，探討的主要不是事物本身，而更多地關注「性」、「理」、「心」等《大學》中的概念，過度糾結於此，耗費精神。顧炎武早就批判過這種情況。他指出，僅僅以粗通《四書》便可科舉升官的科場考試，使得士人「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入。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率天下而為欲速成之童子，心術由此而壞。」⁵⁸ 針砭當時的考試制度的弊病，可謂一針見血。其實對客體世界的研究，只看經書，必然狹隘。如果連比較具體地涉及社會現實知識的經書都不讀，只是繞著幾個抽象的、而且因人而定、各人界定又不清晰的概念繞圈子的話，那還談什麼深入探究萬物之理？人類的思維需要抽象的概括，但個別的具體的永遠比抽象概念豐富，深入的研究更需要在抽象之上的具體展開。

第二，朱子「格物」說的思維取向。朱熹說：「即物窮其理」，主張對外在萬物進行接觸，但其「窮其理」的最終趨向，是強調返回人的本身、本性，即「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歸根到底，側重的不是對客體的規律的考究，而是尋找分散在萬物中先天的或自我內心的「道」或「理」。（因為對朱熹的「理」有不同理解，這是個在哲學界還有爭論的問題，此不討論。）世界乃「理一分殊」，萬事萬物之「理」，最終歸結為「吾心全體大用」。把外在的世界和人的內在本性聯繫起來，有其合理之處（認識不可能離開人的主體），但是把外在的大千世界都視作是單一的收斂的「道」或「理」的「分殊」，這一命題則有著忽視各種事物特殊規律的可能。在對這一概念剛性地、獨斷地解釋環境中，很容易就抹殺了對具體事物深入探究的思考趨向。

⁵⁸ 顧炎武：《日知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一六，頁1256。

就在《大學章句》在東亞地位日見提高，被奉為經典之際，意大利的數學、維也納的天文學，邁開了通向現代科學的步伐。⁵⁹而在《大學》流行的15世紀以後數百年間，原本在不少科學技術領域領先的中國卻止步不前。比如，作為新時代科學基礎的數學就始終沒有走出「符號化」這關鍵的一步。⁶⁰究其原因當然各種各樣，而作為內在因素的思維方式而言，朱熹式的「格物致知」恐怕難辭其咎。

（二）關於國家形態和「天下」觀

《大學》提出了「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但是對於「國」的具體形式和「天下」的內涵卻未具體討論，照搬的是儒家《周禮》的模式。東亞各國對國家形態的認識一直限於《五經》——或者說基本是《周禮》的模式，也就是《大學》所歸納、劃定了的框架。《大學》關於國家形態，強調「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大學章句集注》「傳之第三章」），即建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以「仁信」為本、注重等級綱常基礎上的。作為中世紀的國家，其優劣自可再論。而問題在於，中國和東亞，最高統治者把持著對於《大學》等《四書》經典闡釋的絕對權，顯現出一種絕對化的意識形態，無論「國」或「天下」，都被概念化、剛性化、形骸化了。由於對「治國平天下」概念解釋的固定化和缺乏開放性，因此就缺乏內容的充實和隨時代變化的生命力。

同樣是「治國」，13、14世紀英倫三島的「大憲章」，15世紀英國莫爾描繪出的「烏托邦」，18世紀法國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勾畫的「社會公意」，1848年《共產黨宣言》描繪的、代替現在社會的「將是一個以個人的充分發展為社會發展前提的聯合體」的理想、提出的「巴黎公社」模式等，都在不斷展開變化。這時的中國或者東亞卻一直停留在《大學》的模式之中。直到清末康有為等人大力變法，還要「托古改制」。民國時梁啟超帶著他的那些很有思想的學生們漫遊歐亞，看到英國議會中的「伯里璽天德」

59 陳方正：《繼承與叛逆》（北京：三聯出版社，2009年），頁523。

60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6年），頁257。

(President)、「赤亞門」(Chaiman)、「士壁架」(Speiker) 還感到大為新奇。⁶¹

「平天下」也是如此。雖說中國人早就發明了指南針，也有著「四海」的概念，但是 15 世紀當葡萄牙人的帆船憑藉羅盤，滿懷著豪情向美洲新大陸進發的時候，我們的鄭和船隊卻落下了從印度洋歸來的風帆。在明代，畫出了在世界佔領先地位的地圖，但是當利瑪竇帶著世界地圖到中國時，中國的大多學人眼中的「天下」還僅僅只有東亞這局部之地。⁶²

恰恰就是《大學大全》等欽定《大全》頒佈流行的時代，中國開始在世界上落後，這難道是偶然嗎？中國的改變，當然不能只以「外國」作為標準而簡單照搬，中國的社會和國家形態只能紮根在中國大地上萌發成長，不可能外加給中國社會。但是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說：「研究中國文化不能以西學為座標，但必須以西學為參照系，文化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⁶³ 封閉化、固定化，非中華民族之福，一個民族的發展需要廣闊的空間，需要廣闊的思維。回顧歷史，這是否值得我們深思呢？

(三) 對待經典的態度及研究方法

在古代的中國社會，對經典的態度大致有兩類：一類是闡述，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意見加以解釋；一類是考究，欲探究其本原的面目而進行考證。前者對經典加以闡述解釋，其根本的目的不在於對經典本身的理解正確與否，而是「六經注我」，重點在表明自己的見解。如前所述宋代朱熹用《大學章句》闡發他的「三綱八目」，明代王守仁以《大學》闡述他的「致良知」。儒學以外，如釋德

61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節錄》，《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七，頁61。

62 榎一雄《榎一雄著作集》第7卷所載《論古今形勝之圖》及頁267所附《古今形勝之圖》（東京：汲古書院，1994年），關於中國「天下」觀的變化和對世界認識的過程，近年多有論說。

63 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20。

清借用《大學》來闡釋佛教，撰有《大學疑》，⁶⁴近代的康有為則是以經典之名為變法呼號。在日本，伊藤仁齋解說《大學》等書，荻生徂徠的《大學解》，在批判朱子同時，都是為自己的學說構築學理基礎。熊澤蕃山用《大學和解》來發揮自己的「濟世」觀念，中江藤樹的《大學考》、《大學解》則是闡述他所理解的陽明學，俱借用經典發揮己見。⁶⁵朝鮮半島的茶山丁若鏞、越南的黎文敵也都是如此。

披著經典的袈裟，念著自身的經文。這樣的研究容易借助傳統的影響力，引起社會的效應。但是，因多依附於傳統經典，往往就會缺乏理論的徹底性和與生活的直接關聯性，輕捷有餘而深厚不足，結果往往輕易地被推倒，甚至連同攜帶的那些充滿活力的要素也被拋棄。近年使用此法之人，更愛套用克羅齊（Benedetto Croce）的話：「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這本來有著一定合理性的論斷成了一切借經典自由發揮者的護身符。

還應看到，用這種方法思考和研究，往往容易被原來經典的話語概念和思維框架所束縛，形成一種思維定式。一種理念，如果只是限於觀念的翻弄，用絕對的剛性手段限定最終的範圍和結論，不能在現實生活中展現出其存在性，不允許思想充分的展開，那麼就必然成為發展的禁錮，其生命力就必然枯萎。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對意識變化的形態和研究方法的問題，是否應該引起更多的關注呢？

（四）對中國文明，或者東亞文明的價值判斷

如果說上述的幾個方面是和《大學》直接有關，那麼更廣泛地看，對《大學》在東亞流布和影響的探討，必然又和對《大學》所概括的儒學觀念或東亞傳統文化的判斷、即如何看待儒家思想的問

64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頁303。

65 關於日本各家對於《大學》的闡述，參見日本源了圓編：《江戸の儒學——大學受容の史》。

題有關。近代以來，全盤否定者在東亞各國都有。最先突破儒家文化樊籬的日本在明治時期的「毀佛滅儒」，中國五四時期的「打倒孔家店」，文革時期的「徹底裂」、「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俱屬此類。朝鮮半島、越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脫離「漢字」，深層也有著否定《四書》等儒家文化的因素。

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如中國的梁漱溟，沿襲其師伍庸伯、嚴立三之說，認為「《大學》所云欲齊家、欲治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便要知道修身為本，而從事於修身功夫——這是一定不易的法則。」⁶⁶ 日本的島田虔次認為：「儒教的綱領書《大學》說的『格物致知、治國、平天下』是說實踐萬物一體的具體化之道。」⁶⁷ 他們都認為，《大學》以及儒學，在現實的生活中有著應當肯定的內容，不僅在東亞具有普遍性，而且至今仍有值得世人秉承的文明要素。

自上世紀 50 年代以後，出現了所謂亞洲四小龍騰飛和「儒家和東亞經濟」等關於「東亞價值觀」和儒學的討論，則是這一問題在社會層面的展開，⁶⁸ 這問題的討論擴展到了整個世界。上世紀 60 年代以後，美國學者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李文森（Joseph R. Levenson）等也多有論說。⁶⁹ 上世紀 90 年代初，日本舉行了三次「漢字文化圈研討會」，頗有反響。

近年關於中國傳統文化有沒有現代價值、中國的道路和普世人類價值的論爭，就其問題的深層來看，也都和對包括《大學》在內

66 梁漱溟：禮記大學篇伍氏說綜述，《梁漱溟全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四卷，頁88。

67 島田虔次：《中國思想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頁615。

68 關於這一問題的討論著作甚多，參見金耀基：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韋伯學說的重探，收入張文達等編：《臺灣學者論中國文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296-316。

69 方克濤：英美學界對於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之研究：回顧與展望，《臺大文史哲學報》第53期（2000年11月），頁127、133。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De Bary, *Noe-Confucian Ori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的《四書》為代表的儒家觀念或東亞傳統的評估有關。在現今和未來的中國，個性、特殊性和普遍性，傳統和現代這類問題의 思考和爭論不會結束，必然在新的形勢下以新的形態展現出來。《大學》或許就是一個非常具體的聚焦點。中國經歷了近五百多年來的停滯、紛爭、變動、落後，一百多年的沉淪、搏擊、升騰、反復的過程，在進一步探討未來道路之際，反思對待經典的歷史經驗，筆者認為這無疑是非常必要的。

Essay on *Daxue (The Great Learning)* in East Asia and Related Issues

LI Qing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Kanazawa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formation of *Daxue (Great Learning)*, with respect to the author and changes of text, and also examines its spread in East Asia (Japan, Korean Peninsula and Vietnam). On the basis of the discussion, this article also investigates related issues in Confucianism.

Keywords: *Daxue (Great Learning)*, East Asia, Confucianism